

# 长使伟人留遗风

——《许广平忆鲁迅》读后感

王永昌\*

## 在鲁迅面前“忘记自己”的人

许广平同志是鲁迅的学生、战友和夫人。鲁迅生前，他和这位文化革命伟人艰危相扶，患难与共，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在生活上照顾他，工作上协助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鲁迅逝世以后，她忍着余悲，冒着危险，为保护遗物和整理遗著，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折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她忠贞不渝，抱着九死无悔的决心，坚强不屈地进行着斗争。几十年来，她不断命笔，先后著文，介绍鲁迅的斗争事迹，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这些文章尽管发表的时间有早有晚，涉及的方面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只叙鲁迅的事迹，很少谈到自己的情况。冯雪峰同志在为《欣慰的纪念》所作的序文中说过：“我们如果要深入地研究鲁迅先生的各方面，则许广平先生和鲁迅先生之间的生活和感情如何等等，以及许广平先生本人，也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但是许广平同志却非常谦虚，她曾经打比喻说，她做一些事情，“像病人被输过血似的，浸透了鲁迅先生的指导”（见《忘记解》）。这段真诚的自白，给我们透露了一点心声：在鲁

\* 本文作者原为许广平同志的秘书，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工作。

迅面前，她决心要变成一个完全“忘记自己”的人。所以，尽管她写了不少文章，解放前的部份，存有不少底稿，解放后的部份，也为她备有剪报资料，但她很少主动考虑过集印成册的问题。已经问世的两个集子，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提议选辑的。在《十周年祭》中，她曾经说过，鲁迅对她“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这，或者就是她所以“忘记自己”的原因吧！只因忘我才命笔，长使伟人留遗风。她的执笔为文，完全是为了远播鲁迅的遗风。

### 历史“快门”的鲁迅剪影

许广平同志撰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大都是应报刊杂志的约请，临时执笔，限期交稿的。因此，一般说来，文章篇幅不长，语言简括，而且为要符合报刊性质，内容有时只侧重某一方面，这都是我们可以想像到的。但即使如此，她也能通过很短的篇幅，往往为我们记述鲁迅的思想风貌，情趣爱好，通过历史摄影机的“快门”，给鲁迅留下一幅幅清晰的剪影。比如《青年人与鲁迅》中记述，鲁迅在上海时期因为过着半地下式的幽居生活，不能和青年们接触，因此时常感到非常寂寞。“有敲门声了，他就赶紧伏在窗口看看，是不是他的客人。一面躲藏，一面希望有人来”。这就真实地描写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心声，使我们仿佛感到那颗赤热的心脏仍在怦怦跳动。又如同一篇文章记述，在北京时期，“有一天落雨了，我撑着伞到了鲁迅先生的寓所。后来，他给我写信，里面附了一张图，一只小刺猬拿着伞走，真神气”，这就把鲁迅风趣幽默，兼能绘画的特点，如实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天》，这篇文章含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为亲人在最后弥留之际的一言一动，作了最真切的录相。

当我告诉他《译文》广告来了，《死魂灵》也登出了，别的也连带知道了，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说“报纸把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来他在关心别人的文字。虽然在这样苦恼状况底下，他还记挂着别人，这，我没有了解他，我不配崇拜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那一颗可爱可敬的心呀！让他埋葬在大家伙的心之深处罢！

鲁迅一生有过不少活动，在长辞人间的最后一天里，有这样一个常见的举动，前后也不过只有几分钟，但是仅凭一霎那的眼神，就能窥探出心底深处的活动，如果没有相知最深、亲密无间的感情，是很难察觉到这种心灵活动的。仅此一点，就能使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在鲁迅研究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此外，文章描写鲁迅如何支撑着身体，“每个字改正了又改正”，用最大的毅力，坚持了许久，最后才写完了他给内山先生的那张便条，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充分表现了鲁迅坚韧不拔的顽强性格。当天鲁迅由于虚弱过度，遍身盗汗，“揩他手，他就紧紧握我的手”，对亲人的照顾，表现了由衷的感激，对即将来临的永别，表示了难言的悲痛。读了这种摧人心肝的文字，能不感到痛彻欲绝吗？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但是，“他就来不及等到明天”，“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读着这种血泪倾注的文字，听了这种呼天抢地的悲声，谁能不和作者一样，为失去这一位伟大人物而同声一哭？！谁又能不和作者一起，对黑暗的反动统治发出不共戴天的诅咒？！古语说，“纸张寿于金石”，革命者留在纸上的光辉形象，比统治阶级用金石刻成的碑文，还要留传得久远。读了这种文章以后，

深深感到这是的的确确的事情。

### 零金碎玉的府藏

鲁迅一生的战斗业绩和他洞察一切、鞭辟入里的言论，在浩瀚汪洋、巨帙联册的《鲁迅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但在他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精粹的谈论，却并没有全都写进著作。对此，许广平同志，曾以自己的笔墨，记下了这些“集外”的文章。比如：“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见于最早的《献词》）；“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见于一九三八年写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像这些闪闪发光、掷地作金石之声的语言，在这本《许广平忆鲁迅》中，我们可以查到不少。它象零金碎玉的府藏，为我们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在鲁迅生前，许广平同志曾经打算有意识地记录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想经过鲁迅校阅后编辑成册，再作介绍。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工作，未能持续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仅以《片断的记录》来看，它里面记述的鲁迅言论，就充满了生动的辩证法，直到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同C先生谈起中国人的极端性，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

对于一个人的看法，鲁迅主张不要片面和绝对化，“金要足赤，人要完人”，那是世界上没有的事情。但是他也反对另一种极端性，看到孙传芳晚年吃素，就原谅他的“杀人凶暴”，看见吴稚晖不坐人力车，就忘了他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敌对地位的本质。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克服主观片面、防止形而上学，不是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吗？！

### 沿着鲁迅的足迹前进

许广平同志不但是鲁迅生活中的伴侣，而且又是斗争中的战友。早在北京时期，他就向鲁迅表示，“愿作一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见《两地书》），后来，当有些人攻击鲁迅的时候，她就斩钉截铁地表示：“那么，应战就是了，我绝不竖出反叛之旗”（见《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他这样说，也这样作。鲁迅生前，她和鲁迅心心相印，息息相关，艰危相扶，患难与共。鲁迅逝世以后，她又继承鲁迅遗志，发扬鲁迅战斗精神，走完了自己的道路。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中国的国土。当时，她留在“孤岛”上海，每逢鲁迅忌日，近在咫尺的鲁迅墓，她不能亲去致奠。但她毫不屈服，在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按照鲁迅的遗志，几次公开地提到朱德、毛泽东的名字，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身上（见《周年祭》、《鲁迅先生大病时期的重要意见》等）。嗣后不久，遭到日本宪兵队的逮捕，威胁、审讯、电刑、监禁，都不能使她低头。这是因为她想到了鲁迅的教诲：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绝没有一致的利益，因此拼出性命，对日本侵略者反抗到底。正当抗日战争处于极端艰苦的时候，有些论客大放厥词，“以为某人也被鲁迅所反对，无怪日本要为民伐罪，深入中国了”，对于这种为虎作伥的澜言，许广平同志非常愤慨，立即通过为王士菁《鲁迅传》作序

的机会，痛加驳斥，表示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又与日俱增。但是每一想起鲁迅反法西斯的斗争事迹，她就无所畏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广大民主战士，向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黑暗王朝发动攻势。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人民革命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通过《在欣慰下纪念》这篇文章，作者以愉快的心情向长眠地下的亲人诉说：“现在真是可以告慰的了”。读着这样的文章，我们为鲁迅高兴，也为坚持鲁迅斗争方向的许广平同志高兴，他们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 对本书编校工作的一些意见

如前所述，无论鲁迅生前还是鲁迅逝世以后，从国内到国外，只要有危害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事情发生，不管敌人如何强横，环境如何险恶，许广平同志总是踏着鲁迅的足迹，迎着风雨，挺身向前。据粗略统计，四十年来，她先后撰写纪念鲁迅的文字，已达五十万字以上。凡有这些，不但是研究鲁迅最珍贵的史料，而且也是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线索。在鲁迅逝世四十年以后的今天，在许广平同志逝世也已十多年的今天，整理、汇编一部《许广平忆鲁迅》这样的专集，对于广大读者无疑是非常需要的。前几年，有一个单位曾经着手这一工作，但因各种原因，这部拟议之中的专集，未能问世。现在，在一些鲁迅研究专家的热情赞助之下，在许广平同志生前友好郑公盾同志的具体帮助之下，经过辑录者马蹄疾同志的努力，这样一个辑本，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欢迎的。

鉴于这样一类专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读者希望它精益求精，更臻完美，那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但在阅读之后，觉得马蹄疾同志的辑本尚有一些不足之处，现在不揣简陋，作为“千

虑一得”，冒昧提出，想来不能算是苛求吧！以下仅就选目、分类、校订和考释等方面，略加评议，仅供参考。

（一）选目方面：据辑录者说，他费时两年，共得文章115篇。因为马蹄疾同志和作者生前未能一面，所以很难全面了解情况。我们从已有的选目来看，发现收集的文章，属于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居多，至于作者和朋友的通信，广播电台的讲话，却很少见。（通信一类，只收《致袁家和》一篇，其实，这位受信人并不是熟人，只不过就集邮问题作了一些答问。）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漏的方面。这里我们可以随手举一个例子。一九五八年新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前，许广平同志给当时编辑之一的王士菁同志写过几次信，其中有这样一封：

士菁同志：

背后草拟一说明，是否可插入《幸福的家庭》，篇末或作附注，说明的内容，是鲁迅生前亲口对我说过的。（以上正面。）

据鲁迅对人说，他替许钦文编了《故乡》，还怕出版后销路不佳，为使新作家得到鼓励起见，鲁迅不惜写出《幸福的家庭》那样的模拟的文字来。于此可见鲁迅对青年是如何用尽方法替其“捧场”，以介绍给读者的。（以上背面）

《彷徨》中的《幸福的家庭》确有一个“拟许钦文”的副标题。老一辈的作家为了奖掖后学的青年，用了一个模拟的拟字，其用心可谓深矣。这里许广平同志以见证人的身份，说明了这个“拟”字的真正用意。她代拟的那段注文开头云“据鲁迅对人说”，这里的“人”，正是许广平同志自己。像这样重要的通信，如果我们不加收集，若干年后，恐怕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件历史事

实了。

说到广播讲话，无论对国内国外，都有不少次数。记得一九五六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许广平同志在杭州对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作过一次录音讲话。这篇讲话，回顾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史实，引用了明末王思任的两句名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对鲁迅热爱故乡，反对黑暗的态度，再次作了说明。录音播放以后，受到了浙江广大听众的欢迎。类似这样的讲话稿在辑录本中未见一篇，这，恐怕很难说是全豹吧！看起来，辑录者原来也想做一些拾遗工作，所以有时一篇文章，即使同一内容，只在不同报刊发表，（如《鲁迅对妇女的同情》和《鲁迅回忆录》中的《同情妇女》），也都尽量收录，但像《鲁迅回忆录》中的《瞿秋白与鲁迅》、《向往苏联》这两节文章，却又从辑录本中删去了，这恐怕也和辑录者原来的打算，是自相水火的了。

（二）分类方面：根据《编例》，本书共分五辑。细检目录，感到这种分类有待商榷。比如，第一辑被定为“各个时期的纪念文章、讲稿”，第三辑为“专题研究鲁迅一个方面的著述”。但实际上，收入三辑的不少文章，如《鲁迅和青年》、《和小朋友谈鲁迅》、收入第四辑的《鲁迅的日常生活》，都是一九五六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据我记忆，这种讲话颇多，辑本尚有遗漏）而收录文章，没有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标列，读者如果需要查阅某年某月某刊发表了某篇文章，某年某月某人作了一件什么事情，却又不容易翻检，所以这种分类方法，是否方便读者，颇值得斟酌。鲁迅说过，凡有文集，不外有两种编法，一种是分类，一种是编年，“倘要知人论事，是非看编年文集不可的”。许广平同志所写的这些纪念鲁迅的文章，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留下了曲折的历史足迹，如果采

用编年的方法，不是对读者更为方便一些吗？

（三）校订方面：据《编例》说，“所收各篇，原文在引录鲁迅著作时偶有讹误或引文中有明显刊误者，这次作了订正”。这样作确有必要，也是辑录工作的内容之一。但在阅读全书之后，发现在这方面，还有一些疏漏。比如“革命的爱在大众”，这原是鲁迅的一句名言，见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的书信，本书225—226页引录时，没有错误，但在318页，却被误植为“生命的爱在大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相去甚远，这是不能不加以辨正的。再如62页有云：“《鲁迅书简》：与友人书信自一九二三至三七年函札六十九封，三闲书屋印行”。鲁迅逝世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最早影印的《鲁迅书简》，最后收录的也是十月十八日致内山完造先生的那封绝笔信，三七年又如何能与友人函札来往？肯定有误，应据影印的《鲁迅书简》加以更正。尤其令人怀疑的是706页中，录存的章太炎写给鲁迅的那幅中堂，辑录本附录了黄裳所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一文，把其中的“在谷满谷，在阮满阮”，定为“杜谷满谷，杜阮满阮”。这是很可讨论的一个问题。章太炎书赠鲁迅的这一段话，录自《庄子·天运》篇，原意为奏乐时声音遍及各处，比喻道的无所不在，后来因以“满阮满谷”形容人物众多。黄裳同志专门涉猎过许多古籍，他这样勘定，也许有一定根据，但《庄子》里面的这段话，很多常见的刊本，如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也都作“在谷满谷，在阮满阮”，辑录者对这样重要的一段古典文献，都未做一点“校订”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漏之处。

引文和字句固然需要校订，历史事实尤其需要订正。本书所收《鲁迅和青年》一文中说，鲁迅有一次因为“给向培良看稿子而吐了血”。这是在一次纪念会上的讲话，作者一时误记了。向

培良其实应为高长虹，应据李霁野同志的回忆文章加以订正。在同一篇讲话中，还有这样一段：“一九三六年，鲁迅因为一个叫做人凡的青年又被国民党杀害，曾经写了一篇《写于深夜里》，请史沫特莱先生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当时，史沫特莱曾经警告说，文章刊印出来，对你会有危险。但鲁迅说：‘这有什么关系，必须有人出来说话呀’。”这里，人凡“遭国民党杀害”，当为“遭国民党迫害”，而鲁迅因发表《写于深夜里》的那一段谈话，其实是一九三一年左联五烈士牺牲之后，在写作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之后的谈话。这些地方，因为是一时误记，后来作者在写《鲁迅回忆录》时都根据资料，详加考核，作了订正的，而辑录者不察，在收录前文时，连一个“参见”某篇的案语都未加进，这那里叫做“偶有讹误”都“作了订正”呢？

（四）考释方面：收入本书的文章，很多写于解放以前。当时，由于环境限制，作者在谈到一些人物时，有的隐去了姓名，有的只用拉丁字母代表。现在，情况变化了，条件许可了，就应对这些地方，加以考查注释，以方便读者。比如本书236页，作者提到张友松“头一次来见的时候，说明他的姊姊是在北京做社会活动遇害的”，家里很困难，请求鲁迅给以帮助。因此，鲁迅才给了很大支持，帮助他办了一个书店。这里所说的张友松的姊姊，名叫张挹兰，是一个早期的女共产党员，因为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北京和李大钊同志同时被害。许广平同志的这篇文章，写于日寇统治下的一九三八年，对这些情况，当然不能直说。现在详加说明，就能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鲁迅对共产党人的满腔热忱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意志。又如128页，说到《鲁迅年谱》的定稿经过，作者曾经指出：“关于实际参加工作方面，还请了和他一同参加过的F君订正了不少”。这里所说的“实际工作”，当指左联和自由大同盟等项工作，而F君则指冯雪峰同志。

当时作者不能直说，现在辑录时就应在这些地方加注说明，以免读者猜想。此外，这些文章中还提到不少事情，如作者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时，有一位朋友家属受到牵连，在上海无法居住，只好“回乡去了”。这位朋友，正是当时地下党负责人王任叔同志。当时情况危急，他险遭毒手，幸亏许广平同志事先作了安排，在事件发生时打发海婴以取药为名到他家去报信，这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牵连。其他如唐弢“弃家出走”，柯灵“坐老虎凳”等等，涉及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经历不少。对这些问题，如能做一些钩沉考释的工作，使读者对鲁迅逝世前后发生的某些事情有所了解，这恐怕也不能算是过分的要求吧！

× × × ×

从许广平同志开始撰写纪念鲁迅的文字开始，到她停止写作，前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而这些文章涉及到的一些事情，则要上溯到更早的年代。如何更好地编录这样一本专集，马蹄疾同志做了一次初步的尝试。但是如前所说，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我们应以严肃的态度，来要求这本专集的编录工作。我在这里提到辑录工作存在的某些问题，目的也正是为了使它更加臻于完美，以后如有再版的机会，希望辑录者能够搜集更多意见，慎重考虑，详加修订。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后，如有一本更加丰富完备，更加翔实可靠的《许广平忆鲁迅》问世，从保存文献资料的角度来看，能够使鲁迅的遗风长存，贻惠后世，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一九八〇年三月三日初稿

一九八〇年十月六日修改